

107202

97
6264.406
14
2

红军长征在西南

HONGJUN CHANGZHENG ZAI XINAN

成都军区政治部宣传部 编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6·成都

405796

主编：蒋维勇 邓高如
副主编：赵明仁 马 竞
顾问：郑 汕 黄成志
撰 稿：郑 汕 黄成志 田虎青
赵 康 谷飞琼 赵 刚

前　　言

60年前震撼世界的长征，是指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第一方面军（中央红军）、第二方面军、第四方面军，在1934年秋天至1936年10月间先后进行的一次大规模的军事政治战略大转移。长征中，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将士，从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的体验、比较中逐步觉醒，选择了自己的领袖，经过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甩掉了洋拐棍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找到了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指导下独立自主地解决自己国家革命的道路，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把党和红军从“左”倾错误中解放出来，使党由此走向成熟，把党的工作重心由国内革命战争转向抗日民族战争，胜利实现了政治战略的大转移。长征中，各路红军为执行党中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充分发挥了各自的主要作用，进行了惊天地、泣鬼神的英勇战斗，创造出许许多多以少胜多、以劣胜优、出奇制胜、化险为夷的光辉战例，粉碎了国民党政府几十万军队空中侦察轰炸，地面和江河的围追堵截，跨越了气候恶劣，人迹罕至的雪山草地，战胜了无数艰难险阻，创造了人类战争史上旷古空前的奇迹，胜利抵达抗日救国的前线，胜利实

现了军事战略大转移。

这次大规模军事政治的战略转移，从时间、空间以及主要的活动内容上看，绝大多数都是在西南地区进行的。从时间上看，整个长征历时两年，两年中以中央红军于1934年12月15日进入贵州黎平到1936年8月5日红二、四方面军先后离开西康包座计，在西南四省转战活动了一年零八个月之多。从空间地域上看，以中央红军所历地域计，长驱二万五千里，纵横11个省，走遍了大半个中国，经过10个少数民族聚居和杂居地区。沿途攻占的县城44座，有38座在西南境内；渡过的22条主要江河有14条在西南境内；翻越大山20座有12座在西南境内，特别是其中的5座雪山全在西南境内；10个少数民族地区也几乎全在西南境内。从长征中的主要活动内容看，中央红军沿途共进行了380多次战役战斗，其中著名的强渡乌江战役、四渡赤水之战（二渡后的娄山关战斗）、遵义战役、兵临贵阳、西进云南、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等战役战斗，均是在西南地区进行的；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为解决自身的生存和发展而同各种错误倾向进行的一系列政治斗争，如黎平会议、遵义会议、扎西会议、苟坝会议以及与四方面军会师后同张国焘另立中央、分裂红军的斗争，也都是在西南境内进行的。

综上可见，西南地区，是红军长征历时最久，里程最长，活动范围最广，进行战役战斗最多，解决政治问题最集中，处理与兄弟民族关系事务最频繁的地区。红军长征过西南，播下了革命的火种，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这是我们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力量源泉。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我们作为红军的后代，一定要用实际行动把长征精神发

扬光大，使红军传统代代相传。学习红军精神，就要像红军先辈那样，不论革命遭受多么大的挫折，始终毫不动摇地、坚定不移地保持崇高的、远大的政治信念；就要像红军先辈那样，一旦在斗争实践中选定了自己的英明领袖和以领袖为核心的领导集体，就自觉地维护她的权威，保证政令军令畅通；就要像红军先辈那样，为着共产主义事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前赴后继，始终保持旺盛的革命斗志和献身精神；就要像红军先辈那样，为了革命胜利，为了共同的革命目标，始终发扬团结互助，先人后己，亲密无间的阶级友爱精神；就要像红军先辈那样，为了人民的利益，关心群众，爱护人民，正确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学习红军精神，就要在邓小平理论指引下，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中央军委领导下，为建设西南边疆，保卫西南边疆，维护社会稳定，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成都军区政治部宣传部

一九九六年三月十日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长征开始.....	(1)
一、红一方面军开始长征.....	(1)
中央红军的发展历程.....	(1)
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	(3)
突破四道封锁线.....	(6)
改变进军方向.....	(10)
二、红四方面军开始长征.....	(12)
红四方面军的发展历程.....	(12)
建立川陕根据地.....	(16)
强渡嘉陵江西进.....	(21)
迎接中央红军北上.....	(25)
三、红二、六军团开始长征.....	(28)
红二、六军团的创建与会师.....	(28)
湘鄂川黔根据地的开辟.....	(32)
红二、六军团长征的开始.....	(34)

第二章 红军长征过贵州..... (38)

一、中央红军进入贵州.....	(38)
转兵入黔.....	(38)
抢渡乌江.....	(42)
智取遵义.....	(53)
建政黔北.....	(58)
二、遵义会议拨航向.....	(61)
会议的酝酿筹备.....	(61)
会议的胜利召开.....	(64)
会议的伟大意义.....	(69)
三、四渡赤水出奇兵.....	(74)
一渡赤水，进军川南.....	(74)
二渡赤水，回师黔北.....	(82)
三渡赤水，声东击西.....	(90)
四渡赤水，兵临贵阳.....	(91)
四、红二、六军团过贵州.....	(99)
巧渡鸭池河.....	(99)
开辟黔、大、毕.....	(102)
转战乌蒙山.....	(109)
激战来宾铺.....	(112)

第三章 红军长征过云南..... (117)

一、中央红军乘虚进军云南.....	(117)
挥师入滇.....	(117)
兵逼昆明.....	(123)

直驱金沙	(126)
二、抢渡金沙江	(127)
巧取三县	(127)
智夺渡口	(129)
胜利渡江	(136)
三、红二、六军团转战云南	(141)
激战普渡河	(141)
六甲阻击战	(144)
席卷滇西北	(146)
巧过金沙江	(148)
通过藏民区	(150)
 第四章 红军长征过四川	(154)
一、胜利通过彝族区	(154)
攻打会理	(154)
出敌不意走冕宁	(158)
彝海结盟	(162)
二、越过天险大渡河	(167)
强渡大渡河	(167)
飞夺泸定桥	(173)
翻越夹金山	(177)
三、懋功会师及一、四方面军过草地	(181)
懋功会师	(181)
北上川陕甘	(183)
征服水草地	(188)
脱离险境	(195)

四、红二、四方面军会师北上.....	(199)
再过草地.....	(199)
张国焘另立中央.....	(200)
百丈关失利.....	(202)
建立博巴政府.....	(208)
红二、六军团入川.....	(211)
甘孜会师.....	(214)
共同北上.....	(218)

第五章 红军长征结束.....	(221)
一、红军三大主力会师.....	(221)
突破腊子口.....	(221)
胜利到陕北.....	(225)
三军大会师.....	(229)
二、长征胜利的伟大意义.....	(232)
三、继承发扬红军长征的革命精神.....	(237)

第一章 长征开始

一、红一方面军开始长征

中央红军的发展历程 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亦称中央红军，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由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直接领导的一支主力部队。这支部队，是由南昌起义，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平江起义和湘南、闽西、赣西南、弋（阳）横（峰）、百色起义中诞生的武装力量所组成，在激烈残酷的战斗中不断成长壮大起来的。1927年9月，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工农革命军进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把党的支部建在连上，实行党代表和军队内部的民主制度，奠定了新型人民军队的基础。接着，率领部队转战到井冈山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创建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1928年4月，朱德、陈毅同志率领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队和湘南农军转战到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队伍胜利会师，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后来，彭德怀、滕代远率领由平江起义组成的红五军也到达了井冈山，同红四军会师。这两支部队，构成了红一方面军的基础和骨干。此后，红四军转战赣南、闽西，创建赣南、闽西根据地，以后发展成为中央革命根据地。1929年12月，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通过

由毛泽东主持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进一步明确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规定红军的性质是执行革命任务的武装集团；强调革命政治工作的重要地位，用党的路线教育部队，纠正各种错误思想；解决了如何建设新型人民军队的重要问题，树立了我军建设史上重要的里程碑。

1930年6月，以红四军为骨干组成红一军团；以红五军为骨干组成红三军团。8月，红一军团、红三军团合编为红一方面军，共3万余人，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治委员。红一方面军的成立，标志着红军建设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在毛泽东、朱德领导下，红一方面军不断发展壮大，并在游击战争“十六字诀”基础上形成了战略上内线持久防御战、战役战斗上外线速决进攻战和诱敌深入、集中兵力、运动战、歼灭战等一整套正确的红军作战方针原则。1931年12月，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1.7万余人在宁都起义，参加红军，改编为红五军团。以后，又相继成立了红七、红八、红九军团和若干个军，以及红军学校等，都列入红一方面军建制。到1933年夏，红一方面军发展到约10万人。与此同时，根据地建设也不断发展，中央苏区成为拥有数百万人口，数十个县的红色政权。

1931年1月，在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上，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者篡夺了党中央的领导权。王明自封为“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实际上他对中国革命的理论和实践一窍不通。从1932年初起，由于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者在加紧推行错误的政治路线的同时，还推行了错误的军事战略。他们把红军的三大任务缩小为单纯打仗一项，忽略军政、军民、官兵一致的原则，不适当强调红军的正规

化，反对当时以游击战和带游击性的运动战作为主要作战形式，反对积极防御，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在“左”倾教条主义者的领导下，不仅丧失了“九·一八”事变后发展起来的抗日反蒋的有利形势，而且导致了红军遭到严重损失，苏区也日渐缩小。但中央苏区由于毛泽东等为红军制定的建军原则和作战原则在广大指战员中有深刻的影响，1933年初，中央红军仍然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重大胜利。

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 蒋介石不顾“九·一八”事变后日寇进一步窥视华北，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局势，顽固地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于1933年下半年，集结70万兵力，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和邻近的湘赣、闽浙赣等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大规模“围剿”。这次“围剿”，敌人采取“三分军事，七分政治”和“碉堡推进，步步为营”的新战略，逐步压缩革命根据地，然后寻红军主力决战，最后达到消灭红军、摧毁中央苏区的目的。这时，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代表李德（德国人，原名奥托·布劳恩，化名李德，又名华夫），在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秦邦宪）支持下，排斥了毛泽东对党和红军的领导，由李德、博古指挥一切，毛泽东只负责地方工作。王明“左”倾派别的代表实际上掌握了中革军委的领导权。李德、博古积极推行“两个拳头打人”、“御敌于国门之外”的冒险主义方针，要求红军跳出苏区，去进攻敌人坚固设防的地方，结果使红军作战陷入了被动不利的地位。此后，他们又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变冒险主义为防御中的保守主义，采取消极防御的战略方针，要求红军进行以堡垒对堡垒的阵地防御作战结合“短促突击”，用劣势的红军同优势的敌人拼消耗，东堵西击、穷于应付，使

战线日渐收缩，根据地日渐狭小，红军处于更加被动的地位。

为了力挽危局，毛泽东多次提出粉碎敌人“围剿”的正确意见，但都遭到拒绝。1933年11月20日，曾在上海坚持抗日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将领发动了反蒋的“福建事变”，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毛泽东等提出应利用蒋介石抽调军队对付“福建事变”的机会，以红军主力突破敌人的堡垒线，进入苏浙、皖、赣地区，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人的统治中心，迫使敌人回援江浙，红军即可乘机粉碎敌人“围剿”并援助“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但是博古、李德拒绝了毛泽东等的正确意见，结果，蒋介石在镇压了“福建事变”后，又重新调兵来进攻根据地。战争进行了一年，不仅未能粉碎敌人的“围剿”，而且使红军遭受严重损失，陷入严重的危机。这时毛泽东又提出将红军主力“向湖南中部前进，调动江西敌人到湖南而消灭之”的正确主张，这个建议又被“左”倾机会主义者断然拒绝。这样，打破第五次“围剿”的希望就完全断绝，只剩下长征一条路了。1934年1月至3月，蒋介石集中兵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和红军发动了新的、更加猛烈的进攻，敌人的堡垒逐步向根据地中心推进，红军进行的许多战役、战斗均遭失利。4月中旬，敌人集中11个师进攻广昌，红军则集中9个师与之决战。广昌战役打了18天，红军虽然给敌人以重大杀伤，但自身也付出了很大代价，伤亡5500余人，而广昌依然失守。博古、李德等“左”倾机会主义者，就是这样不惜血本同敌人拼消耗。面对成批战友和红军战士的牺牲，彭德怀同志曾愤怒地斥责李德、博古是“崽卖爷田心不疼”，毛泽东同志则比作是“乞丐向龙王爷比宝”。7月上旬，敌人开始向中央苏区的中心地

带全面进攻，李德、博古又命令红军“分兵把口”、“全线抵御”，形成“六路分兵”，使红军在一系列的防御战斗中继续受到严重损失。到9月，中央苏区只剩下不足7个县的狭小区域。

1934年7月，在外敌入侵，内战不停，粉碎国民党第五次“围剿”已经不可能的情况下，中共中央、中革军委为在政治上宣传我党的抗日主张，揭露国民党卖国内战罪行，推动抗日救亡运动发展；军事上威胁敌人后方，吸引和调动敌人，以减轻对中央苏区的压力，我党先后派出两支部队突围远征。7月7日，红七军团6000人以北上抗日先遣队名义，在寻淮洲、乐少华、粟裕等率领下由瑞金出发，经福建、浙江转入赣东北，与方志敏领导的红十军会合，组成红十军团。1935年1月，红十军团在北上途中遭到7倍于己的敌人围攻而失败。寻淮洲牺牲，方志敏被俘，8月在南昌英勇就义，表现了共产党员坚贞不屈的革命气节，在狱中他写下了《狱中纪实》、《可爱的中国》等光辉战斗作品。1934年7月23日，任弼时率领红六军团9700余人，退出湘赣革命根据地（即井冈山根据地），进行突围转移。并于同年10月，在贵州东部与贺龙同志率领的红二军团会合。当时红六军团负有为中央探路和寻找立脚点的任务。两军会合后成立了二、六军团总指挥部，贺龙同志任总指挥，任弼时同志任政委，统一领导二、六军团。随后二、六军团一起转移到了湘西地区。红六军团的西征揭开了红军长征的序幕。

1934年9月26日，各路国民党军加紧向中央苏区中心发起总攻，并拟于10月14日进攻瑞金、宁都，苏区进一步缩小，区内人力、物力已很匮乏，博古、李德决定在10月底

或 11 月初沿红六军团前进路线，实行战略转移，准备到湘鄂西去与红二、六军团会合。根据决定，开始部署转移，以红二十四师和地方兵团接替中央红军防务，主力开始向瑞金、雩都集中。以项英、瞿秋白、陈毅等组成中共苏区分局，坚持苏区斗争。红军总政治部发布关于准备长途行军与战斗的政治命令。为了便于随军行动，将中共中央、中央政府、中革军委机关，直属部队和各军团进行了编组并规定了代号。军委纵队代号红星，下辖两个野战纵队。第一野战纵队代号红安，由红军总部和干部团组成，干部团是由红军大学、公略步兵学校、彭杨步兵学校、特科学校合并组成，博古、李德、周恩来、朱德等随该队行动；第二野战纵队由中央机关、后勤、卫生、工会、青年团等组成，代号红章，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等随该队行动。红一、三、五、八、九军团代号依次为“南昌”、“福州”、“长安”、“济南”、“汉口”。中共中央先后派刘少奇、陈云、凯丰为红三、五、八、九军团中央代表，以加强对这些部队的领导。

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在军事上、政治上的严重错误，造成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中央红军被迫于 1934 年 10 月突围，退出中央革命根据地，实行战略的大转移——长征。

突破四道封锁线 1934 年 10 月 10 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领军委纵队和第一方面军主力、后方机关共 86859 人，分别从江西的瑞金、于都和福建的长汀等地出发，开始进行长征。队伍出发时，根据地的群众纷纷聚集在道路的两旁，眼含热泪，怀着万分难舍的心情前来送行，他们紧紧拉着红军战士的手，嘱咐说：“你们可千万要回来啊！我们等待着你们

胜利的消息。”战士们都依依不舍离别根据地的父老乡亲。

长征之初的战略编队是以中央纵队居中，红一、九军团为左翼，红三、八军团为右翼，红五军团为后卫。红军长征后，蒋介石立即在江西、湖南、广东、广西等省，设置了一道道严密的封锁线，堵截红军。长征开始之初，王明路线的领导者实行战略退却中的逃跑主义，慌慌张张率领红军退出根据地，对红军突围长征这样重大的战略行动，没有对广大干部和红军战士进行广泛的政治动员，对红军为什么要撤出根据地？要到什么地方去等重大问题没有进行解释，而是秘而不宣、拔脚就走。并且中央机关把大批笨重的机器和“坛坛罐罐”都带上了，还有上千名挑夫组成的运输队伍，就像一次大搬家。因此，红军行动十分缓慢，大队人马在山间小路上拥挤不堪，往往一夜只能翻过一座山坳。这种“抬轿式”、“大搬家”、“甬道式掩护”的逃跑主义，表现了李德和博古的惊惶和仓促，使主力红军成了中央机关的掩护队，严重影响了红军的机动能力，极大地削弱了红军的战斗力。

红军经过一个月的英勇奋战，于10月21日在江西的安远、信丰间突破了敌人的第一道封锁线；11月8日在湖南的桂东、汝城间又突破了敌人的第二道封锁线；11月15日，红军在湖南宜章、彬县间突破了敌人的第三道封锁线，进入嘉禾、兰山、临武地区，然后以急行军赶到湘江东岸。这时，蒋介石已判明红军西进的战略意图，并集结了40万大军，利用湘江的天然障碍，构成了第四道封锁线。任命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率薛岳、周浑元两部16个师77个团分5路纵队专事“追剿”中央红军主力；令粤军、桂军北出截击，黔军东出到湘黔边堵击，并以航空兵实施侦察和轰炸，企图将

红军歼灭于湘江、漓水以东地区。

当时，毛泽东曾建议乘各路敌军尚在调动，薛岳、周浑元两部人马尚未靠拢之际，组织力量反击，杀一个回马枪，集中兵力寻机歼敌一路或一部，以扭转战局，变被动为主动。红三军团长彭德怀也建议本部速向湘中挺进，威胁长沙，寻机消灭敌军小股，迫使敌人改变部署，以阻击、牵制敌人，而中央红军大部则进占湘西之溆浦、沅陵一带，迅速发动群众，创造战场，粉碎敌人进攻。但是，博古、李德拒绝了毛泽东、彭德怀的建议，一味向西退却，丧失了在湘南歼敌的良机。

当红军向湘江前进时，敌人的飞机就撒下传单，公然叫嚣：“我们奉总司令的命令等你们好久了，请你们快来”、“来进我们安排好的天罗地网！”此时，红军受到左有广西军阀部队，右有湖南军阀部队的夹攻，后有国民党中央军和广东军阀的尾追，处境十分危急。但李德、博古等人一筹莫展，只是命令红军强打硬攻，准备夺路突围。

11月25日，中革军委下达了强渡湘江的作战命令，指出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冲出敌军重围，这是关系红军生死存亡的关键一战。27日，红一军团先头部队第二师已在广西东北部界首顺利渡过湘江，架设浮桥。28日，红三军团第四师先头第十团在界首以南渡过湘江，红五军团已扼守湘江东岸相应各要点，作好掩护部队渡江，迟滞追击之敌行动的准备。而此时，军委纵队距湘江渡河点尚有80多公里的路程，如果轻装急进，可以迅速渡过湘江，减少部队损失。然而由于仍带着那么多“坛坛罐罐”，行动迟缓，每天只走二三十公里，致使湘江两岸的部队为了掩护全军部队过江而与优势敌军展开激战，付出了沉重的代价。